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域下城市垃圾分类的选择与策略

谢亦忱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垃圾分类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实践，亟待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价值指引与方法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通过本体论批判重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以认识论突破揭露资本逻辑对生态的异化，借方法论指引确立社会主义生态实践的路径，为剖析城市垃圾分类困境提供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域下，通过超越资本逻辑的制度重构、培育阶级意识与生态公民的主体解放、重塑生态价值观的文化革新三重路径，才能推动垃圾分类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为破解城市生态治理难题提供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方案。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城市垃圾分类；资本逻辑；生态文明；生态治理

The Selection and Strategies of Urban Waste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Xie Yiche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nsify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China'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rban waste classification, 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urgently needs the value guidance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reconstru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rough ontological criticism, exposes the alienation of the ecology by capital logic through epistem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establishes the path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practice with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the predicament of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only through three paths –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beyond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liberation of the subject by cultivating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ecological citizen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by reshaping ecological values – c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turn to its essenc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providing a practical solution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urban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cit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capital log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城市垃圾分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切口，承载着重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是垃圾处理方式的革新，更是对工业文明价值观的根本性反思，需要从哲学高度审视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问题缘起：生态治理的时代叩问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却也使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然资本化”与“资本无限增殖”的矛盾持续激化，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日益扩大。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1]的异化逻辑，不仅造成自然

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更引发垃圾泛滥、环境污染等城市生态治理难题。

在城市垃圾分类场域，这一矛盾外化为资本对生态治理的系统性渗透：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依赖资源的高消耗与废弃物的低成本排放，流通领域的分类设施建设受制于资本回报率的考量，消费领域的环保宣传则可能异化为资本塑造消费符号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垃圾分类实践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治理窠臼，难以触及生态危机的制度本质。

作者简介：谢亦忱，男，汉族，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当代价值，在于为生态治理提供“批判—建构”的双重维度：一方面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揭露资本逻辑对生态的异化；另一方面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引，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策略，旨在为破解城市生态治理困局提供兼具学理性与现实性的解决方案。

二、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核心范畴

（一）本体论批判：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根基，突破传统哲学将自然视为纯粹客体的二元论框架，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形成对象化关系：一方面，自然作为物质前提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2]。这种辩证关系既反对将自然降格为资本剥削的对象，也拒斥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自然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3]。这一论述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体论基础——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逻辑主导下对这一辩证关系的割裂与异化。

（二）认识论突破：资本逻辑的生态解蔽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认识论价值，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资本增殖逻辑对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本质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扩张过程必然导致“自然的资本化”与“生态的异化”。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自然资源视为可无限攫取的生产要素，将生态环境当作容纳废弃物的“公共垃圾桶”，形成“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代谢链条^[4]。这种逻辑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如森林砍伐、矿产掠夺），更通过商品拜物教将人类需求异化为对商品符号的无限追逐，使消费脱离实际需要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进一步提出“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剥削将生态危机转嫁至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心—边缘”的生态殖民结构^[5]。可见，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认识论批判，为剖析城市垃圾分类中生产端、流通端的异化现象提供了理论透镜——分类体系的资本俘获、回收产业链的利润导向，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延伸。

（三）方法论指引：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革命性，在于将生态解放与社会变革相结合，提出通过社会主义实践超越资本逻辑的方法论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对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仅包括对物质生产的合理组织，

也涵盖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的科学管理。列宁进一步提出“保护自然生产力”的命题，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遏制资本对生态的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方法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可持续发展相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在垃圾分类实践中，这一方法论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超越资本利润优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机制（破除技术官僚的单向度治理）、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思维（整合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引，为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现实批判：城市垃圾分类的异化图景

（一）生产端矛盾：资本积累的生态代价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资本积累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攫取，导致生产与生态的断裂式发展。当代城市垃圾的爆炸性增长，本质上是资本扩张驱动的“商品拜物教”产物——企业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通过缩短产品自然生命周期、制造“计划性报废”等手段加速商品迭代，使生产过程成为“生态裂隙”的主要制造者。例如，电子废弃物中含有的重金属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进入环境，正是资本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规避社会责任的典型表现。这种“外部不经济”现象，暴露了资本逻辑与生态规律的根本对立：资本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榨取的“免费午餐”，却将环境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公共体系，造成垃圾分类在源头治理层面的结构性失效。正如福斯特所言，资本主义的“代谢断裂”理论深刻指出，生产体系对自然循环的破坏，使得垃圾分类沦为末端治理的“头痛医头”式修补，难以触及生态危机的制度性病灶^[6]。

（二）流通端困境：分类体系的资本俘获

城市垃圾分类的流通环节本应是衔接生产与消费的生态治理枢纽，但在资本逻辑渗透下，逐渐异化为资本增值的新场域。从垃圾收运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来看，资本通过技术垄断与标准制定权的掌控，使分类流程服从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例如，部分垃圾处理企业为降低运营成本，将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混合处理，导致前端分类成果在中端运输环节功亏一篑，这种“分类流于形式、处理依赖焚烧”的现象，实质是资本对公共生态治理的功能性替代^[7]。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资本主导的流通体系通过制造“技术万能论”意识形态，将垃圾分类简化为智能化设备的应用问题，忽视其背后的社会关系重构需求。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表明，当垃圾分类的技术系统异化为资本控制的工具，劳动者（如环卫工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亦因制度性排斥而受挫^[8]。这种资本对流通环节的系统性俘获，使得垃圾分类的生态治理目标让位于资本增殖逻辑，形成“越分类越混乱”的治理悖论。

（三）消费端异化：主体行动的意识形态枷锁

消费领域的生态异化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主体认

知的规训。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消费主义通过广告媒介、符号价值建构等手段，将“过度消费”包装为“幸福生活”的代名词，使公众陷入“商品拜物教”的认知陷阱。这种意识形态操控导致垃圾分类在消费端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消费者被塑造为“被动的垃圾生产者”，对商品的符号价值追求远超实用需求，造成一次性产品泛滥与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环保责任个人化”的话语叙事，将生态危机归咎于个体行为习惯，掩盖了资本对消费模式的系统性塑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指出，这种认知偏差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维护现有生产关系的手段——当公众将垃圾分类视为单纯的道德义务而非社会制度变革诉求时，资本对生态的剥削便得以持续合法化。例如，某些企业通过“绿色营销”塑造环保形象，实则继续推行高污染生产模式，而消费者因缺乏对产业链的完整认知，难以识破这种“生态伪装”，最终使垃圾分类的主体行动陷入“个体努力对抗系统性危机”的低效循环。

四、实践策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

（一）制度重构：超越资本逻辑的顶层设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前提^[9]，这一论断为垃圾分类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实践维度，制度重构应聚焦三重逻辑突破：

其一，确立生态优先的生产制度体系。针对资本积累导致的“生态裂隙”，需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关键生态治理领域的主导性掌控，建立覆盖生产全链条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例如，将生态红线制度嵌入产业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征收累进式生态税，强制要求生产者承担废弃物循环利用责任，从源头上遏制“外部不经济”现象。这一制度设计的哲学基础，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本体论认知，将生态效益纳入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核算体系，使生产过程重新服从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本质。

其二，构建去资本化的公共治理架构。资本对垃圾分类流通环节的俘获，本质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市场化越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重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政府需强化生态治理的公共属性，通过建立垂直化的垃圾分类监管体系，剥离资本对分类标准制定、设施运营的垄断性影响；同时，依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将垃圾分类纳入社区公共事务范畴，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这种制度安排呼应了列宁关于“社会公仆”理论的当代阐释，即通过抑制资本对公共权力的渗透，确保生态治理的人民性价值导向。

其三，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激励机制。资本逻辑主导的治理模式往往以效率优先掩盖公平缺失，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实现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可通过建立“生态权益共享机制”，将垃圾资源化收益的一定比例反哺社区公共服务，使公众在生态治理中直接获得物质利益与发展机会。这种“生态红利全民共享”的制度设计，既契合

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内在统一”的方法论原则^[10]，也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打破“环保责任个人化”的认知误区，使垃圾分类从外在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在利益驱动的自觉行动。

（二）主体解放：阶级意识与生态公民的培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资本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劳动群众沦为生态危机的“被动承受者”与“无意识参与者”^[11]。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通过政治实践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使其认识到生态危机与阶级剥削的同构性——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是处于资本链条末端的劳工群体与边缘社区，而生态治理的本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权的重新界定。例如，在垃圾处理设施选址引发的邻避冲突中，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常使弱势群体承担更多环境成本，唯有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将分散的环境维权诉求升华为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动力。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倡导的生态公民，不仅是具备垃圾分类知识的行为主体，更是能够通过公共领域对话参与生态政策制定的权利主体。这一过程需依托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如通过工会、社区自治组织等载体，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融入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叙事，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阶级共同体的实践共识。同时，需通过教育体系的革命性变革，打破资本主义教育对“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培养，在中小学与高校课程中植入生态批判理论，引导青年一代认识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形成超越消费主义的主体认同。

主体解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同频共振。在垃圾分类实践中，这意味着赋予环卫工人、资源回收从业者等劳动群体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权利，改变其作为资本雇佣劳动者的被动地位；同时，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社会化改造，将企业的生态责任从法律义务转化为劳动者监督下的实践自觉。唯有当生态治理的主体从“被资本支配的原子化个体”转变为“自觉的阶级共同体”，垃圾分类才能真正成为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

（三）文化革新：生态价值观的重塑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盛行的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打破这一桎梏，需从意识形态层面展开文化革命，重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

教育体系是文化传承与价值塑造的主阵地，应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深度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设置系统的生态教育课程，改变传统教育偏重“征服自然”知识传授的倾向，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历史观为理论基石，引导学生理解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与人类社会的依存关系。例如，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实践教学，让学生直观感受垃圾过度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培育其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生态责任感。

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中具有强大影响力，需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构建生态文化传播矩阵。一方面，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打破学术话语与大众认知的壁垒；另一方面，发挥

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树立绿色发展的正面典型，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生态治理的文化氛围。如通过对垃圾分类优秀社区、企业的报道，形成示范效应，推动生态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广泛认同。

文化革新还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道家“道法自然”、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通之处。通过学术研究、文化创作等形式，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基因，为当代生态价值观注入民族文化底蕴。例如，以传统诗词、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自然之美，唤起公众对自然的情感认同，使生态保护成为基于文化自觉的行动选择。

五、结语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垃圾分类的异化困境

本质上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断裂的现实投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批判性价值，在于揭示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并指明超越路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逻辑的结构性制约，重构“人—自然—社会”的辩证统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与生态公民培育，破除消费主义对主体行动的意识形态桎梏；借由生态价值观的文化革新，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这一路径不仅为垃圾分类实践注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核，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智慧，确证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历史必然性，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哲学注解。

参考文献

-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8-160, 529.
- [2]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2-53.
- [3]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04.
- [4]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08-209.
- [5] 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9: 368-372.
- [6] 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5-47.
- [7] 陈学明. 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12.
- [8]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2.
- [9]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44.
- [10] 李济广. 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192.
- [1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2.